

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

陈 平

内容提要: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争议涉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劳动分工的发展方式究竟是趋同还是多样的?均衡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文章从历史和比较的分析出发,论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英美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道路,而且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要求中国探索不同于已有市场模式的新路。政府的作用不能由意识形态先验地决定。中国所处的生态历史条件,要求有远见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再造中国,并引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

关键词:中国道路 华盛顿共识 均衡经济学 演化经济学 远见政府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2)03-0001-23

一、引 言^①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 30 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 2008; Fukuyama, 1993, 2011; Rodrik, 2011; 陈平, 1979, 2004, 2010b; 吴敬琏, 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 2010a)?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 2006; 韩毓海, 2009; 李世默, 2012; 潘维、尚英, 2012; Morris, 2010; Zakaria, 2011)。中国过去不少

作者简介:陈平,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源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2010 年 12 月 11 日作者在南开大学举行的会长论坛上的讲演,在会长王艳灵教授督促下修改成文,最后定稿将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结集出版。

感谢王艳灵的组织督促,感谢吴敬琏、田国强、孙迪、尹尊生、陆丁、史正富、张维为、刘昶、崔之元、陈昕、韩毓海、潘维、金钟伟、李世默、秦晓、裴素萍、宋立刚、唐毅南、李华俊、龙希成、蔡宇晨、陈曦蔚对中国模式问题富有启发意义的讨论。文中错误之处由本人负责。

^① 引言和文章第二部分“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中的部分内容已在《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 年第 2 期上发表,为保持观点的完整性,应作者的要求予以保留。——编者注

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

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 30 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

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1981;陈平,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 and 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着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从眼前利益出发保护夕阳产业,从而错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2004,2010e;Chen,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华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

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

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以为,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

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2010d,2010e,2011;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1979,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

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

(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

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 6.9 亿,占世界人口 10%,却控制着世界 90% 的资源,消耗世界 40% 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 2 倍,韩国的 27 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 1.6 亩,只占美国的 1/5,不到俄国的 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 55 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的政府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 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

表 1:世界主要国家环境资源比较表

资源 国别	人均可耕地(亩)	年降雨量(mm)	离海岸平均距离(km)	人均发电量(kWh)
中国	1.6	645	660	305(1980)/2,601(2008)
日本	0.5	1,406	12	8,491
韩国	0.5	1,371	40	8,414
希腊	3.5	371	10	5,541
意大利	1.9	944	39	5,023
荷兰	0.7	760	75	6,500
英国	1.4	754	19	6,104
法国	5.0	650	132	8,930
德国	2.1	933	146	7,217
俄国	12.3	691	435	6,820
美国	8.0	1,201	460	13,528
印度	1.8	2,168	425	589
巴西	4.5	1,782	2,301	1,129

数据来源: CIA World Factbook, Wikipedia, Nationsmaster. com。中国国家统计局。各国发电量为 2007 或 2008 年数据。离海岸平均距离用该国土地面积与海岸线长度之比计算。

(二)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 2)。

表 2:世界代表国家和地区的真实 GDP 增长率

国别 \ 时段	1970s (%)	1980s (%)	1990s (%)	2000s (%)	2009s (%)	2010 (%)	R(倍)	Gr(%)
中国	6.2	9.3	10.4	10.5	9.2	10.4	32.4	9.1
韩国	9.0	9.7	6.5	4.1	0.3	6.2	16.8	7.3
越南	3.8	5.6	7.6	7.3	5.3	6.8	10.5	6.1
印度	3.0	5.0	5.5	7.7	9.1	8.8	8.5	5.5
巴西	8.3	1.6	2.5	3.6	-0.6	3.6	4.9	4.1
日本	3.8	4.6	1.2	0.7	-6.3	4.0	2.8	2.6
美国	3.2	3.2	3.4	1.6	-3.5	3.0	3.1	2.9
德国	2.9	2.3	1.9	0.9	-5.1	3.7	2.2	2.0
前苏联	4.8	4.7						
俄国			-3.8	4.8	-7.8	4.0	2.8	2.6
东欧	4.4	2.3	-2.0	4.3	-5.7	3.4	2.6	2.4
西欧	3.1	2.3	2.1	1.1	-3.8	2.6	2.3	2.1
东亚	4.4	3.5	3.3	4.0	-0.1	7.0	5.4	4.3
拉美	6.1	1.5	3.2	3.1	-2.2	5.8	3.9	3.5
世界	3.8	3.1	2.8	2.5	-2.3	4.0	3.3	3.0

数据来源:联合国统计局。真实 GDP 以 2005 年美元计算。10 年平均增长率,如 1970s(年代)为 1970~1980 真实 GDP 的平均增长率。危机表现用 2009 与 2010 年的该年度相对上一年的增长率。R 为 1970~2010 真实 GDP 的增长倍数,俄国按前苏联 GDP 的 70% 估计。Gr 为 1970~2010 的年平均增长率。

20 世纪 60~70 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 1990; Stiglitz, 2004; 陈平, 2005, 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国排前 10 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 10%,危机之后超过 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 20 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 世纪 90 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 3、表 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 20 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 20 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

表3:东欧和前南斯拉夫国家经济转型比较表(设1990年真实GDP=100%)

国家	低谷(年份)	R(谷底/90)(%)	2009增长率(%)	R(2010/1990)(%)
阿尔巴尼亚*	1992	66.8	3.3	107.1
保加利亚(EU2007)	1997	75.0	-5.5	125.5
捷克(EU2004)	1992	87.9	-4.7	145.7
匈牙利(EU2004)	1993	84.9	-6.8	126.3
波兰(EU2004)	1991	93.0	1.6	212.5
罗马尼亚(EU2007)	1992	79.4	-6.5	131.3
斯洛伐克(EU2004)	1992	79.8	-4.9	174.7
波黑**	1993	83.0	-2.9	453.3
克罗地亚**	1993	64.1	-6.0	111.3
黑山**	1993	43.3	-5.7	107.0
塞尔维亚**	1993	44.2	-3.1	76.2
斯洛文尼亚**(EU2004)	1992	86.1	-8.0	156.8

*表明该国有严重的内部不稳定。**表明该国有内战或与邻国有领土武装冲突。

表4: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转型比较表(设1990年真实GDP=100%)

国家	谷底年份	R(谷底/1990)(%)	2009增长率(%)	R(2010/1990)(%)
阿美尼亚**	1993	46.9	-12.4	145.6
阿塞拜疆**	1995	41.9	9.3	203.5
白俄罗斯	1995	65.1	0.2	180.2
爱沙尼亚(EU2004)	1994	67.0	-14.3	136.8
格鲁吉亚**	1994	27.7	-3.8	69.1
哈萨克斯坦	1995	61.4	1.2	152.9
吉尔吉斯斯坦*	1995	50.7	2.9	98.6
拉脱维亚(EU2004)	1993	52.6	-17.7	82.0
立陶宛(EU2004)	1994	56.1	-14.8	109.5
摩尔达维亚*	1999	34.1	-6.0	57.3
俄罗斯**	1998	58.3	-7.8	95.9
塔吉克斯坦**	1996	31.6	4.0	82.7
土库曼斯坦	1997	59.7	6.1	165.2
乌克兰*	1999	40.8	-14.8	88.8
乌兹别克斯坦	1995	81.1	8.1	193.6
前苏联(加总)	1998	57.3		109.3
蒙古	1993	79.7	-1.3	186.6

*表明该国有严重的内部不稳定。**表明该国有内战或与邻国有领土武装冲突。

在改革开放的 32 年间,中国真实 GDP 增加了近 20 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 1 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 3、表 4、表 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 1996 年真实 GDP 比转型开始的 1990 年下降了 27%,俄国 1998 年比 1990 年下降了 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 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 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 500% 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 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 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 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

表 5:世界主要地区真实 GDP 增长表(1978~2010 年)

国家/地区	真实 GDP 增长倍数	平均年增长率(%)
中国	20.6	9.9
东亚	3.6	4.1
世界	2.4	2.8
北美	2.3	2.6
西欧	1.8	1.9
拉美	2.4	2.8
东欧	1.7	1.6
前苏联、俄国	1.3	0.9

数据来源: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真实 GDP 以 2005 年美元计算。真实 GDP 增长倍数为 2010 与 1978 年真实 GDP 的比值。

(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

仔细观察表 2,就可以看出: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 30 年和前苏联 70 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列宁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

笔者曾在 1985 年开车从西德去过捷克和东德,近年多次去过德国、东欧和俄国。社会主义下的东德在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的普及上高于西德,没有类似美国大城市中的贫民窟。但是,居民消费的多样性和汽车、计算机技术比西方落后,原因是国防开支挤出民生工业。前苏联过高估计西方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低估了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竞争的能力。前苏联民族矛盾导致的政治瓦解,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必然输给资本主义经

济。假如东欧像中国那样自主地向西欧选择性开放,东欧工业会迅速成为西方的竞争者。东欧实行休克疗法时,西方跨国公司借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名,让东欧骨干工业被西方全面收购或破产,从而消除了西方的一个巨大竞争对手。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为中国产业升级打开大门。世界历史的巨变不能完全归之于体制,历史是人创造的。中国出乎意料地超过苏联,重要原因是邓小平的远见高于前苏联的领导人。毛泽东反对苏联式的垂直劳动分工,也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区域竞争格局铺平道路。

以笔者的观察,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的瓦解,原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前苏联用专制手段来维持东欧的稳定,导致东欧人民对西方自由民主抱有幻想。德国统一之前,东西德的明智人士主张东西德要渐进统一,才能稳定调整经济和政治结构。但是西方民主的选举政治导致政治家的短期利益高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东西德在 1991 年 7 月实行没有过渡期的货币统一。为了获取东德人的选票,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 1 比 1 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几乎是 6 比 1 的真实汇率。这带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成为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理论的经典实验。其结果大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意外! 大笔撒钱不仅没有刺激消费,反而摧毁了东德的工业。统一货币后,东德所有的出口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打破了苏东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使东德企业顷刻丧失东欧的传统市场。东德居民用手中的西德马克,买西方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使东德企业进一步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大面积破产。西德企业向东扩张,东德市场陷入萧条,西德居民不得不交重税支持东德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导致德国利率上升、增长放慢,并拖累欧元区的发展。中国主张均分外汇储备来刺激消费的经济学家,大约不知道德国货币统一的前车之鉴。

德国统一后把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后,笔者到西柏林自由大学讲学,发现柏林经济十分萧条。周末柏林自由大学附近餐馆都没几家开门。惊讶之余,西德学生讲述的故事,方让我醒悟东西方冷战的核心竟然是心理战。原来,冷战期间西德各州补贴西柏林表面的高消费,用媒体制造西方自由繁荣的假象。东德人以为只要翻过柏林墙,自由、民主、繁荣就都有了,人心思变导致柏林墙的倒塌。谁知柏林墙垮之后,西德各州停止给柏林市的财政补贴。柏林没有工业,经济远远不如汽车制造业的南部各州。年青人找不到工作,大批离开东德和柏林,导致当地房价低迷,服务业也一片萧条。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听任沿海劳力密集的制造业外移,代之以服务业的发展。他们不理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托工业和农业创造的剩余,否则还要发展科学技术干什么? 开餐馆和赌场的现代化,城邦小国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生存,中国如此大国要学,岂不荒唐。

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和美欧究竟谁更有竞争力,是实践的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封闭经济的理论,不考虑国际竞争下的复杂格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走过了曲折道路。换言之,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是打出来的,不是西方恩赐的。俄国总统叶利钦以为推翻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就可加入北约,获得西方的援助和伙伴地位,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西方不可能容忍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成为西方强权的平等对手,甚至是挑战者。日本经济学家告诉笔者,日本是缺乏资源的国家,但是任何收购西方控制下天然资源的行为,都被美国视为战争行为而封杀,日

本人只能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债券。索尼收购好莱坞电影商也如同联想收购 IBM 的 PC 一样,障碍重重。中国天真的空想资本主义者,应当切记西方地缘政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政治。

(四) 中国前 30 年的发展奠定中国后 30 年自主开放的基础

否定中国模式的人往往低估中国前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全盘否定计划在奠定中国独立国防与自主经济的成就,无视中国计划经济走过的弯路是西方列强封锁围堵所造成的历史。

2009 年 9 月,曾任巴西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邀请笔者去巴西讲学,并安排我会见巴西总统府的战略规划部官员。巴西官员在会议简报中把巴西地图和中国地图并列,他们参照中国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的分布,用以规划巴西的基础设施。之后,他们告诉我巴西发展的困惑:每次巴西的经济规划刚刚提出,就遭到美欧国家的反对而止步不前。他们问我为何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做出独立的决定?这也是提出“北京共识”的英国观察家雷默(Ramo,2004)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经济学家,所以我的意见和新古典经济学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不同。以我个人的观察,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做出独立的决定,是因为中国有独立的科学技术和独立的国防。相比之下,日本屈从美国的安全压力,就没有独立的金融政策。前苏联自废武功,才不得不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贷款条件。巴西官员对此印象深刻。

我访问东欧时,发现东欧经济相对较好的是波兰。原因是俄国与德国在历史上三次瓜分波兰,所以波兰人不信任西方的私有化方案,保留了若干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如今得以应对金融危机。匈牙利在卡达尔领导的市场化改革中用外国贷款来资助居民消费。休克疗法中匈牙利为了还债,把国有大企业和国有银行全部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外资银行纷纷抽逃资金回救母国,使原来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匈牙利的经济恶化程度远超过波兰。

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反对国企垄断的同时,不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他们不理解美国金融寡头是本次美国与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Johnson,2009;Chen,2009,2010;陈平,2010d)。本人曾在 1996 年就金融改革的战略上书中央(陈平,1996)。我建议仿照中国民航改革的成功先例拆分四大有银行。中央领导批示赞同,却被部门领导否定。理由就是美国的花旗银行等巨头正在兼并,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拆分,如何面对西方银行巨头的国际竞争?中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的扶持,难以单独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

(五) 相信普适价值的人忽视西方市场经济也有多种模式

笔者曾经陪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米勒(Merton Miller)出席留美经济学会 1995 年在上海举行的国企改革研讨会。米勒创立的公司财务理论的 MM 定理假定,完全竞争下企业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是和所有制结构无关。米勒在会上强调说,产权问题虽然重要,却没有优化解。英美型企业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型企业长期行为投资过度。他的话启发我重新认识产权理论的局限,以及历史上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反复浪潮(Chen,2008;陈平,2010c)。产权理论的出发点是保持核心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以保障对股东

而言的利益最大化。但是西方大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现实,导致了看不见的所有者(史正富、刘昶,2011)。西方大企业、日本的家族企业和中国大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类似,但处理的方法不尽相同。

西方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之后,政府都曾经干预经济,直接创办国有企业。其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战争动乱导致市场失败的现实需要。私有企业虽具有灵活多变、易于创新的优点,但也存在急功近利,不考虑长期利益的缺点。地区发展、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就不能只靠私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国有企业的主要责任不是短期盈利,而是保障社会安定,例如创造充分就业、缩小区域差距、应付国际危机等。目前世界上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说明企业效率的核心不在产权结构,而在其他因素(陈平,2007,2010c;Chen,2010)。中国国企改革初期的“国退民进”是为了纠正 1957 年后不加区分地实行公私合营、消灭私有制的过激做法。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就业,必须互补发展。朱镕基“抓大放小”,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但要求大型国企全面私有化,将国企经理人变为垄断资本家,就违背中国改革的国情与现实了。英国的私有化改革的著名案例是英国铁路,私有化后大量裁员,但由于网络效应,分段运营的竞争效率反而降低,目前又重新实行国有化。美国三大汽车厂在这次危机中几乎破产,不得不让政府救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全私营的医疗成本太高。美国医疗技术世界领先,但人均医疗成本是医疗双轨制的欧洲、加拿大的 2 倍,医疗国有制的日本的 3 倍,导致保险公司、制药公司与医院相互勾结,其垄断利润高于其他行业,宏观代价是损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陈平,2010a,2010b)。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垄断阻碍创新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反垄断不分所有制。但是鼓励创新和应对危机,不同所有制可以互补。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都有可能搞裙带关系、短期行为,因而都要严格公司治理,重用人才。所有制不能替代选贤用能。

我访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时,对该所企业家研究室的国际调查大为惊奇。他们注意到北欧国家的创新超过美国。北欧国家许多制度安排和美国大不相同,非常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理想。德国经济学家的调查发现,较小的工资差距(缺乏物质激励),福利社会负担(大政府的主要标志),对发达国家间的创新差距影响不大。从统计上观察,他们发现北欧创新的优势和破产程序的效率有关。与美国的信用制度标准相反,北欧投资方更愿意投资给曾经历过失败的企业家,因为失败的经验有助于未来创新的成功。换言之,保护创业者的积极性比保护投资方的产权更重要。

(六)迷信自由化的人,无视政府市场监管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往往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对立起来,看不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共生演化关系。

市场化改革之初我在安徽,有人鼓吹改革就是松绑。不料原来纯朴的农贸市场迅速出现卖死猪肉和假中药的问题,温州的小商品市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假冒伪劣商品曾经泛滥成灾。“市场看不见的手”并未导致优胜劣败的局面。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之下,政府才推出一系列市场监管和质量认证的措施,逐步改变恶性竞争和逆向淘汰的局面。至今,

西方与中国在药品、食品、金融等市场中,腐败与政府监管方面的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原因不只是信息不对称,而且是法制漏洞,因为暴利比罚金高得多,所以形成了逆向致富的激励机制。从国际比较的标准看,中国监管的程度,在环保上比欧洲差得多,在食品安全上比日本差得多,在药品上比德国差得多。只有在金融领域虽然问题很多,但是在防范金融投机上比西方要严,究其原因是民间反腐败的压力很大,中国资本控制的初衷是防止贪官洗钱和外逃,并非防止西方热钱炒作货币,代价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发展太慢,影响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在银行监管方面,加拿大的经验也可供中国借鉴。当然,政府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竞争。中国国有航空公司在拓展海外业务上的竞争力,可以企及美欧,却不如韩国的民航企业。这可能是人才和领导力的问题,不一定是所有制的问题。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苹果公司的深度调查(Barboza,2012)。他们发现,虽然苹果公司的产品风行世界,给股东创造巨大利润,但是在美国只创造5%的就业,大部分产品的制造在亚洲,主要在中国。美国公司无法和中国企业竞争的主要原因,恰恰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技术、产权、劳工成本,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地方政府的效率和中国产业集群的工业生态结构。但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了营销渠道,创造的财富主要集中在苹果公司的高管和股东手中,这是美国金融危机深层原因的真实写照。以苹果手机为例,产值的58.5%为苹果公司的利润,中国工人所得的比例仅占1.8%,韩国的利润为5.7%,日本的利润仅有0.5%(寒竹,2012)。以为技术加产权可以保证国际竞争的垄断地位,或本国劳工的共同富裕,是西方经济学与媒体共同制造的假象,不是国际竞争的残酷现实。苹果公司也不可能持续维持这样的高利润。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开放与监管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化,而是把握选择性开放的时机与程度。中国资本开放的选择性高于东亚、拉美、东欧,中国今日才得以限制美国金融危机的拖累。中国也有失误之处。日本经济学家对我说,日本绝不会像中国那样,让外国企业占有如此大的国内市场份额,韩国更是如此。中国沿海大城市竞相引进西方五百强,却不大力扶植民族企业。某些领导人误以为西方垄断企业必然代表先进管理模式,忘记技术进步从来是先进的小企业打败保守的大企业,这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是一个错误。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相比,成长的道路要艰难得多。

(七)西方同样面临政府和财团的腐败问题

目前,世界上公认法治最好的地区是北欧,犯罪率、腐败、贫困等问题远小于美国。我访问瑞典时,瑞典经济学家告诉我,北欧历史上是海盗国家,直到19世纪,北欧的腐败依然臭名昭著。后来瑞典的吏治改善,来自一位国王的大力整顿。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也减少了社会腐败的经济基础。越南战争后,瑞典开始接受外国难民,社会治安就不如以前。可见,社会转型和开放是腐败增加的重要因素。国企私有化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我多次访问过台湾,台湾政治最大的腐败是黑金政治。其来源之一是变更土地规划时的政治利益链。台湾工业化之后商业用地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地租差价归地主所有,带来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商人与黑手党可用金钱收买政客改变土地区域的规划,成为黑金暴利的来源。俄国在私有化过程中没有先拆分国有垄断企业,结果私有寡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原国有垄断企业。据估计俄国大部分的经济控制在

黑手党手里。德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但是高铁技术难以实现。印度想学中国的特区也很困难。这些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体制障碍都是土地私有制阻碍经济的结构调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换言之,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上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不同利益集团在议会制下,只有局部利益,没有整体利益(李世默,2012)。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明确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被金融财团俘虏,只有拆散金融财团,才能摆脱金融危机(Johnson,2009)。但是,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措施,花了上万亿美元拯救金融寡头企业,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造成军工、金融、律师三大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长期阻挠社会改革。美国的议会民主制无力约束军火工业、金融寡头和跨国企业对经济的操纵,因为政客竞选依赖财团的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否决了对企业政治献金的限制,把金钱干预政治说成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金钱政治的本质。

中国一些善良的人以为用法制可以解决腐败问题,却没有仔细研究谁制定法律,目的是保护谁的利益?除了科学制定的技术标准,涉及利益的法律绝不是中性的制衡机制。德国学者告诉我,德国法律很严,保护的是老企业、大企业,使德国传统工业领先,但是创新不如美国。哈佛法学家告诉我,德国的私有园林,必须向公众开放,不像美国保护私有产权,业主有权向进入私人产业的陌生人开枪,所以德国的社会矛盾远比美国为小。美国在危机时,企业和政府同时裁员,为了保护股东的利润或政治家的政绩。德国、日本的企业高管却被社会要求减薪,尽量维持员工职位。法律究竟保护资产所有人,还是利益相关者,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法制就有不同的安排(潘维、尚英,2012)。没有在西方形生活的人,很难想象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实质是维护利益集团现状的制度,却不是改革不合理现状的制度。

如何把改善法制与选贤任能相结合,是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难题,制度决定论不符合历史的曲折。郡县制是秦始皇建立的。资本主义的法律是拿破仑建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是邓小平奠定的。历史的偶然性发生在历史必然的交叉点上。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中西文明的分岔有演化论的根基。

三、如何认识中国发展的不同特点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与其先下结论,不如先研究中国发展的特点,然后考察这些特点是否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用中国政治制度和历史的特殊性,来否定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英美经济学家并未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否认劳动分工的普遍规律。

(一) 认识中国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西方观察家把中国模式等价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模式是片面的。因为中国出口加工经济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中国那样的独立国防和科学技术,即使技术先进的日本和德国也要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的金融政

策屈服于美国压力。德国虽然和法国联手创造欧盟和欧元区,但是抵御美国金融投机的能力反而不如中国。北欧小国虽然维持很高的生活水准,但是在国际事务上也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要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当代的国际地位,必须从世界的眼光而非自我中心的角度来观察中国道路。否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受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成就与问题,是目前思想混淆的一大根源。他们认为中国过去 30 年的发展得不偿失。经济增长只是牺牲环境资源和让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劳工的结果。他们看不到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的代价远远高于中国。

举例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始自“言论自由”,而是始自“移民自由”,即先是允许贵族庄园的农奴逃到自治的城市,经过一定时间后成为自由民。殖民主义的发展,从欧洲向非洲、美洲、澳洲的大规模殖民和侵略,何时尊重过殖民地原住民的“人权”!在几百年间的移民总额估计只有几千万人。为此消灭了美洲的马雅文明,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民族战争,外加贩卖黑奴和毒品。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点,后果是难料的创造性毁灭。当新创造的就业数量越来越少于被摧毁的就业岗位时,西方国家便逐步用国籍、签证、工作许可等各种方法限制来自贫困地区的移民。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和富贵病,不得不在重体力和高科技两端依靠外来移民,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冲突。西方国家解决不了富贵病和就业问题,才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逐步放宽言论和选举的限制来维持现状,因为政党轮替根本不触及贫富分化问题。与其在大萧条期间动用军队镇压罢工,不如让老百姓获得抱怨的自由。西方的议会政治,给政治家提供演戏的舞台,给利益集团切实的保障,在发展中国家面前重建道德形象。万事如意,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世上没有不衰的强权,也没有不散的盛宴。

相比之下,中国过去 30 年之间,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高达 2 亿。虽然其中有不少社会问题,例如户口限制、征地纠纷和教育差距,但是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得到改善,没有发生内战和动乱。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社会制度远比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稳定。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使中国的社会成本远比西方和东亚现代化依赖税收和私营保险的成本为低。须知中国人口规模是全部发达国家的 2 倍多,而资源和基础远不及西方国家。

(二)理解中国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野出发

国内一些人简单化地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大政府和大国企。这就无法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差别,以及中国改革前后的差别。

如果政府规模用政府税收占 GDP 的比例衡量,按维基百科的资料,中国为 18%,近于印度;但是远低于福利国家瑞典(48%),法国(45%),德国(41%),英国(39%),俄国(37%),巴西(34%),日本(28%),美国(27%),和南非(27%)。中国过去 30 年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上的飞速进展,主要资金来源于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中国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下降。中国国有单位创造的城镇居民就业占 20%,税负却比西方国家低,可见中国软约束的程度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在危机时政府部门由于债务危机和私有企业同时裁员,加重社会压力,经济复苏缓慢。相比之下,中

国国企创造的就业对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贡献。

所有国家都面临不断改进政府效能和企业竞争力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有改革领导力的政府。政府和企业的规模要随着技术革新和国际竞争与时俱进。先验地谈论小政府还是服务性政府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规模远比发达国家为小。和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部门、国家统计局与药监局的规模难以成为国家决策和市场监管的支柱。但是,不少沿海地区的镇政府建筑却大于解放前南京政府的总统府,规模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原因是地方政府承担了许多其他国家地方政府不管的,经济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功能。中国没有西方的教会,历史上社区稳定先后依赖于宗族、单位和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单位社区瓦解之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日益增多的社区功能,但又无法填补精神真空。国外华人学校逐渐演变为华人社区的核心,部分取代西方的教会功能,值得国内参考。西方法治无法阻挡教会的衰退和家庭社区的瓦解,社会成本增加引发如今的经济危机。中国必须引以为戒。中国的道德和精神教育,如果也能像文化和学历教育那样制度化、具体化和普遍化,也许会使物质和精神发展的不平衡有所改善。中国文化低估了宗教仪式的教化功能。儒家树碑立传也许可以树立道德标杆,但不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占领基层社区。以吏为师不如全民系统的终身再教育。现在系统整理被启蒙运动打散了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科学相整合,是不能忽视的软件工程。

(三) 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探讨

2008 年 11 月 14 日,在美国纽约为 G20 峰会和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建言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 7 条中国经验给美国参考。2009 年 9 月 22 日,我在巴西的讲演中,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规纳为 10 条(Chen,2011)。在红旗文稿的文章中,依据 2009 年 10 月 14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讲演,我把中国经验简化为如下 5 条(陈平,2010a):

第一,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使中国经济在结构上,既有市场经济竞争下技术更新的灵活性,又有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局限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差别所在,就是有无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没有非盈利的教育科研和医疗的发展,社会也不可能有科学进步和长治久安。

第二,政府角色重新定位为“规划协作之手”,其务实效果远超过自由放任的“看不见的手”。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挠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

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这使中国经济结构应对危机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第三,价格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苏联、东欧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信号,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时候,为初生产业提供了适当的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国际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在出口产品面临不平等竞争时,主动降低汇率打开国际市场;在面临亚洲金融风暴时,坚持汇率稳定协助东亚邻国应对危机。须知,2007 年外汇的每日交易量达 3.2 万亿美元,而同年的平均每日世界贸易额只有 \$380 亿美元,不到外汇交易额的 1.2% (Rodrik, 2011)。在美国虚拟经济规模为实体经济的 50 倍,世界 GDP 总量的 10 倍。只有中国稳健的汇率政策和有力的资本管制挡住西方炒家的冲击,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陈平, 2008)。这都强于拉美、东欧、东亚国家,在西方国家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虽然给某些发展中国家创造过成长的机会。但是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使他们难以避免成为西方经济的附庸。中国民族企业在各级政府扶持下的崛起,制约了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国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良性竞争的方向转化。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被美国社会协作的低效拖垮。中国各地特区的不同试验,开创了中国实验式的民主政治和发展道路。中国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与自上而下推行的休克疗法比,分散了试验风险,加快了学习进程。中国过去 30 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繁琐法制和自由减规的两难困境。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中国有钱难买恶法,社会素有公议。西方的程序正义在推进科学发展上有历史作用,但是用其解决社会问题却并不成功,因为社会冲突的解决在于利益协调,辩论和投票无法断定规则本身的优劣。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没有引发美欧议会中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相对美欧有所节制。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四、中国未来的挑战要求远见政府和持续创新

对中国经验抱有疑虑的人,担忧的是中国经济的两个特点,所谓大政府和大国企,会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似乎承认中国模式会妨碍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国企改革。我们理解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担心。但是我认为,事在人为,深刻理解中国问题的所在,应当成为深化改革的动力而非阻力。中国问题和西方问题有个共同点,就是短期行为,一届政府一种倾向,忙于救火、无力防灾。小病拖重,重病拖死。中国建国的基础是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只是五年计划。西方文化追求短期均衡,中国文化追求战略眼光。谁优谁劣,看谁能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为此,首要问题是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发展的障碍,然后才能选择中国改革的方向。假如借鉴西方经验可以解决中国问题,那何乐而不为?如果西方办法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就得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理论方案的选择不能先于现实问题的观察。目前西方经济学家的通病,叫做“*One size fits the all*”(生产的袜子一个尺码),译成中文就是“一刀切”。成功的经验各异,失败的通病皆同。

(一) 中国未来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否效法西方的刺激消费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日益暴露美欧经济的衰落趋势,使许多人质疑东亚经济出口导向模式的可持续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吁成为热门之议。对转变方向有大体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是继续仿效美国的经济模式:转变方向只不过是调转中国与美国的角色。他们主张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和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的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放开资本管制,让人民币升值并转换为世界储备货币,放开利率管制,放开土地管制,用土地私有化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放任沿海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让低端产业出走以逼迫产业升级。更有人主张全民瓜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以此来促进居民消费。似乎中国有条件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来提升人均消费水平。我以为这是当前最危险的空想资本主义。其来源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世界失衡理论。伯南克的主张是荒谬的。因为年轻人打工储蓄,老年人用储蓄消费,是各国经济的普遍规律。要西方老龄化的人口增加储蓄,中国年轻人口增加消费,等于要求年青人不去成家立业,老年人不能养老退休,如此荒唐的主张,哪有历史成功的先例?中国沿海城市克服老龄化的办法只能是开放农民工进城。沿海城市企图增加社保覆盖面来刺激居民消费,导致中小企业不愿雇佣年轻大学生,反而雇佣退休职工来降低社保税的压力,加剧了年轻人的就业困难。世界史上,政府只能救急,养老依靠家庭。中国有远见的家长是投资子女教育,而非留给子女家产,惯坏子孙。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历史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世代保值。要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艰苦奋斗,学习创新。伯南克主张的实质是回避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人口资源的不平衡,而西方老龄化社会日益依靠外来移民的困境。即将面临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刺激消费、产业外移、地产泡沫、经济危机的老路。

(二) 能源和生态危机限制了消耗资源、节省劳力为特征的劳动分工的西方模式

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忽略地球资源对人口与能源增长的限制。

原因是西方世界 10% 的富裕人口,控制了全球 90% 的自然资源,大约消耗了世界一半的产能。美国大张旗鼓地宣传世界贸易失衡,却不提人口资源失衡,是因为西方不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建立的经济特权。

以美国为例,其人口只占世界的 4%,但是消耗全球 20% 的电力和 22% 的石油产量。美国、日本、欧盟三者的人口总和为 9 亿,为世界人口的 13%,但是消耗世界发电量的 40%,石油生产的 43%。相比之下,中国人口 13 亿,占世界人口近 20%,电力消耗世界发电量的 20%,大致相当,但石油消耗量仅占 10%。假如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人均 GDP 以及相应的能源消耗赶上发达国家,目前的差距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而非官方汇率计算,人均 GDP 美国是中国的 6 倍,日本欧盟是中国的 4 倍。按人均能源消耗计算,石油消费美国是中国的 9 倍,日本为 5 倍,欧盟为 4 倍。

假如中国未来 30 年的发展目标是石油消费达到目前欧盟的水平,人口增长忽略不计,那么到 2040 年,中国的石油年消费量将为 139 亿桶,超过目前美日欧石油消费的总和,目前已知的中国石油的储备量 157 亿桶只够 1 年多的国内消费。换言之,中国仿效西方模式的未来经济增长将严重依赖能源进口。有人以为科学技术加市场投资也许可以保证石油生产与消费增长同步。他们忘记了亚当-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受资源和技术水平限制。从目前的技术知识而言,继续维持西方的生活方式只是幻想。世界石油产量在 1979 年达到高峰,此后开始停滞不前,2005 年后逐年下降,预计 2040 年世界石油产量将下降一半以上。如果用天然气或煤局部替代石油,同样面临碳排放和全球暖化的限制。使用水电、风电、太阳能、核电、或其他清洁能源要求大量投资和研发,没有政府规划支持,民营企业难以启动(何祚庥,2011)。替代能源的成本是否能市场接受,不仅取决于技术攻关,还取决于政府的标准和税收政策,是否鼓励新能源,淘汰旧技术。

简言之,目前英美模式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不可能持续。和全球变暖的生态危机相比,能源危机引发的世界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美国主导的以金融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化危机,不是贸易自由主义日益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加速转向资源帝国主义和资源战争。美国的军事开支几乎占世界总军事开支的一半,比仅次于美国的前 20 强国军事开支的总和还多。美国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有七百多个军事基地。美国公开的战略目标仍然是保持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包括围堵中国的地理政治格局(Brzezinski, 2012)。欧洲和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议论:中国崛起将导致中美之间发生争夺资源的大战。中国“和平崛起”的善良愿望,很难安抚西方人士的恐惧,除非中国真正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国内某些人崇拜西方、却不愿正视西方的战争威胁,把政治经济学对西方利益集团的分析斥为“阴谋论”。和我的观察相反,资源战争是西方利益集团公开的“阳谋论”。德国和美国政治家公开宣称欧盟东扩的目标不只是乌克兰,而是整个俄国,目标之一即为获取俄国的丰富资源。假如考虑到核战争在地球上没有赢家,核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可能不大,但是争夺资源的局部战争持续不断。美国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没有结束,伊朗战争已在制造舆论之中。美国和日本联手在中国南海、东海制造战争阴云,都不是空穴来风。

相比之下,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民众,几乎忘记了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教导,对全球地

理政治格局的演变缺乏清醒准备。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可能使中国成为大国中最缺乏战争意志的国家。沿海城市片面追求美国摩天楼式的城市化,在面临能源短缺和局部战争时可能成为敌国威胁的筹码。追求消费而非追求健康发展的民风,使这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二代之间转化为欧美般的骄奢之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训,今天已经出现“二世而斩”。国内教育日趋西方化、贵族化,沿海城市贵族学校的学生适应艰苦环境的素质,不如发达国家的德国和日本。英美式的贵族教育将断送中国老一代打下的基业,值得国人警惕。美国科学家从中美饮食与癌症、心血管、糖尿病、肥胖症等的关联对比研究中发现,现代病的来源是动物性食物。中国传统的植物性食物,使中国乡村居民现代病的比例比美国低得多。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医学家呼吁美国人学习中国饮食方式的同时,中国居民却在仿效美国快餐与奢侈文化大吃大喝,在居民身高体重和寿命改善的同时,也使中国的肥胖病、现代病、与医疗开支追随西方模式急剧增长(Campbell & Campbell, 2006; 翟凤英, 2008)。沿海城市的高房价加产权永久化政策,把沿海城市老龄化的城市居民和近郊农民变成新的食利阶层不劳而获,将像美欧那样由外来移民(先是内地农民,后是南亚移民)来养活,沿海制造业可能重复美欧房地产挤出产业外移的老路,使房地产泡沫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后终结中国蓬勃向上的增长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目前国内盲目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正面临五百年来未有的历史变局。中国不但要改变英美式劳动分工的耗能模式,还要创建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才能走出生态困境。

(三) 中国发展战略的两手准备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从来是两条腿走路,做和平发展和应付战争的两手准备。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中东和南亚人口结构极为年轻,但是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失业率非常高,包括年轻的大学生失业严重,成为目前中东和南亚社会不稳的主要经济根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和亲美军事政权的倒台会加剧美国欧洲在中东的军事卷入,使西方军事力量短期内难以转移到东亚。如中东动乱继续 20 年,则中国可以再争取 20 年和平发展时间。中国如果利用此时间迅速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科技和国防的独立发展,就能在 21 世纪确保世界的领导地位;避免世界大战,并限制中国周边的局部战争。如果盲目乐观,脱离国际大势来追求西方式的高消费和金融泡沫,导致产业出走,社会不稳。则中国将重回动乱反复、受制于人的历史覆辙。如果周边国家在美国支持下挑衅,也不能以退让求和平。中国在没有空军的情况下敢于应对朝鲜战争,在有核武器和导弹的条件下,岂能让美国的恫吓得寸进尺?美国一国的军费超过世界二十强的总和,军事基地遍布全球,面临债务危机还增加而非削减东亚的美军部署。国人不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寄托幻想,必须居安思危。美国是商人统治的国家。美国人教给我的商战逻辑是:“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译成中文是:“打不赢,就入伙”。打架是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的大资本家大企业家都看涨中国市场,看衰美国经济。贸易战也好,资源战也好,美国利益集团究竟有几家愿意和中国陷入长期战争,走着瞧好了。毛泽东佩服喜欢拿破仑,我也欣赏拿破仑的名言:“怕败者必败”。让历史来裁判好了。

(四)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远见政府来规划布局、科技攻关、再造中国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陈平,1979,2004;邓英淘,2010)。西北过度开垦导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使黄河面临断流威胁,长江正重复黄河的命运。南水北调,不如北都南移。目前中国各省的用水恶性竞争,没有流域的规划与协作。中央和地方政府3~5年的任期,只能应付短期突发事件,无力根治生态危机。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以及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中国有能力开发水电、风能、光电、核电,并改善煤电的环境问题,但是必须建能源生态委员会统一规划,科学攻关,制定标准,指导市场,实现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的结合(何祚庥,2011;邓英淘,2010)。严防利益集团固守不可持续的旧技术牟利害民。

中国未富先老,老龄化即将给中国带来超越美国的社会压力。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地理生态极不相称(冀朝鼎,1981;陈平,2004)。大量退休人口和非生产性的行政、教育、医疗单位集中在沿海城市,与工业、农业、运输争地,导致目前沿海城市的房价远高于工作人口收入可以支付的水平,孕育重大的社会危机。尤其京津地区的地下水源已经枯竭,除非解决水源问题,否则发展京津超大城市的计划必然加速恶化华北地区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中部丘陵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却不能吸引老龄退休人口移居青山绿水地区,原因是中国主要的教育、医疗机构都集中在沿海城市。大量青壮劳力外流沿海地区,主要目的是为子女寻求更好的教育机会,并非不愿建设家乡。市场的羊群行为,加剧区域的生态不平衡和房地产差价,单靠凯恩斯政策的供求管理,无法克服结构失衡造成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泡沫。

西方政治的矛盾在产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中国历史形成的省份与部门架构与现代的劳动分工体系不相协调。用西方的政党议会体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免国外收购外国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恐惧和障碍。央行集中大量外汇储备骑虎难下,何不分散部分外汇给有实力的省份独立到国际市场运作,并开放上海的亚洲美元国债市场,参照欧洲美元市场的办法,制衡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

为此,中国应当把行政改革和经济文化的结构调整同时进行。中国可以学习澳大利亚和巴西的行政改革经验,把政治和文化首都留在北京。把国务院的大批行政机关迁往华中丘陵地区,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有利于备战,因为历史证明北京无法防御来自海上之敌。中国的人口和地域大省比欧洲大国还大,难以治理。历史上的科学中心如剑桥、哥

廷根大学都在小城镇,学者和学生才能专心研究,避免商业利益和政治动荡的干扰(陈平,2002)。应当按人口和地理分布,将中国多数省份一分为二或三个小省,将新的省会建在丘陵山地,借机把干休所,主要的大学 and 医院逐步迁入新的省会。如此才能降低沿海工商区的房价,提升内地农村的收入。

城市化要改变目前仿效美国洛杉矶搞超大城市的方针,限制城市居民区与工作区之间的通勤距离为半小时左右,使之可以用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替代小汽车,大幅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土地政策要借鉴美国的土地赠与大学,保障主要的学校、医院在中小城市安心研究,地价房价合理平稳,限制房地产的投机,才有可能建立和维持世界一流的创新体系。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填补宗教缺失的社会精神真空,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为此,必须严格限制美国式的虚假商业广告,限制骄奢淫逸的消费方式,普遍建立财产登记制度,征收房屋空置税。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和累进遗产税,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软件建设必须与硬件投资协调,严格建立企业、事业、军队、行政机构的会计和理财制度,建立有国际竞争力、非投机的金融体系,以免重蹈西方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覆辙。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实行英国式的圈地运动,搞美国式的超大农场。城市化不能把80%的农民赶进城市但是没有稳定生计,成为纽约或孟买式的贫民窟(陈平,2011b)。为了预防战争和天灾,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为将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各地征地补偿办法的差异,鼓励了攀比机制,对后来的基础建设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在地区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以法治国体制,也要逐步提上议程,否则会造成巨大的体制套利的腐败空间。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决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信息技术改变了工业世界集中型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互联网的发展,给缩小城乡差距创造了条件。实现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建设工、农、军、学的小康社会,不是空想,只待规划。如能如此,中国将吸引全世界的有理想有抱负之士来中国工作、学习和定居,从而成为世界创新的排头军,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可以用成功的实验,吸引发展中国家,共同打造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迫使西方寡头集团顺从世界潮流,改变历史发展的轨道。

五、结论和展望

孔子设想过小康社会和大同世界。柏拉图理想国里的统治阶级武士必须是斯巴达式的无产者,而且接受没有个人私利或短见的哲学国王领导。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可能实现从孔子、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因为从事研发的科技人员创新的动力并非来自私利,而是来自兴趣和公心。科学理论的检验,不是来自独裁者的专断或多数人的投票,而

是来自实验的检验。科学团体的自治给社会的自组织发展提供了原型。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获益却掌握在少数财团手中,导致了无数的战争、贫困和腐败。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实验中,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创造了中国新的选贤任能的治理机制,成为效能政府新的典范。中国改革的不足是理论落后于实践,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如能把中国改革的实践制度化、程序化和理论化,中国模式的定型和传播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预防养身之道要进一步科学化,推动科学生活预防健身。学校体育教育和居民备战防灾的训练都要制度化,这点要向日本学习。不能引入西方体制先诱病再治病,把为公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变为少数利益集团利用信息不对称谋取暴利的财团,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医疗黑洞,防止医疗成本爆炸拖垮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式劳动分工节省劳力,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不但争夺资源引发战争不断,争夺市场造成周期性的就业危机,而且持续积累废热废料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美国科技的力量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却无力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在知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陈平,2010f)。

我们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无视生态约束,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结构理论,奥地利学派否认政府是自组织系统的关键组元。马克思认识到世界演化的规律,但是低估了中国和东亚的历史贡献。中国文化的整体论与现代的复杂科学相结合,可以提升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中国的机遇、协商、试验的创新社会,可以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耗能社会竞争共存,并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看不见的手必然要代之以自律协调之手,因为资源有限,生命有限,但是世界的变化和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中国民族不惧上帝,但是尊重历史的裁判。让 21 世纪的历史来裁判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谁更能与时俱进吧。

参考文献:

- 陈平,1979:“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光明日报》,1979-11-16。
- 1996:“金融改革的战略选择和经济秩序的良性循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6,5。
- 2002:“从李约瑟问题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2,2:49-57。
- 2004:《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看经济学变革方向”,《红旗文稿》,2005,11:13-15。
- 2006:“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10。
- 2007:“私有制的神话和多种所有制的现实——德国蔡司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和 MIT 学生之家的经验及启示”,载史正富和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北京:世纪出版集团。
- 2008:“西方金融危机的前景和中国金融的全球战略”,《新华社内参》,2008-11-06。
- 2010a:“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红旗文稿》,2010,4。

- 2010b:“从‘民富国强’与‘国泰民安’的两条道路之争谈起”,《红旗文稿》,2010,23。
- 2010c:“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1:1—26。
- 2010d:“有效市场的失败与生机市场的发展——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新视角”,郜若素、胡永泰、宋立刚编,2010:《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的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e:“经济复杂与均衡幻象:关于市场非稳定与宏观生机的论文集”,《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3:31—41。
- 2010f:“告别摸石头过河?走向观全局航海”,《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五中全会前瞻系列六”,2010-10-18。
- 2011a:“走出凯恩斯-弗里德曼的流动性陷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宏观演化经济学”,中国第4届演化经济学会年会,2011-05-21。
- 2011b:“土地流转,城市模式,与农民转业”,《人民论坛》,2011,23。
- 鄧英淘,2010:《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
- 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 韩毓海,2009:《五百年来谁著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 寒竹,2012:“苹果在中国:对话纽约时报调查记者”,《观察者》, <http://www.guancha.cn/html/60262/2012/02/17/66139.shtml>。
- 何祚庥,2011:“加大水能太阳能风能建设”,《环球财经》,2011-04-08。
- 冀朝鼎,1981:《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世默,2012:“西方民主正在走向灭亡”,《观察者》, <http://www.guancha.cn/html/60262/2012/02/17/66139.shtml>。
- 刘昶,2007:“从福特公司的个案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载史正富、刘昶主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
- 马洪、孙尚清,1981:《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潘维、尚英,2012(即将):“维稳与久安之道”,载《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史正富、刘昶,2011:“看不见的所有者:现代西方企业中的产权革命”,《香港传真》,2011,69。
- 吴敬琏,2011:“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财经》,2011-01-18。
- 翟凤英,2007:《中国居民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变迁的追踪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 [美]T.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坎贝尔 II,2011:《救命饮食: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吕乐欣、倪婉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 Barboza, David, Peter Lattman, and Catherine Rampell, 2012. “How the U. S. Lost Out on iPhone Work.”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2, 2012.
- Brzezinski, Zbigniew K., 2012. *Strategic Vi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Chen, Ping, 2008.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 139-153.
- Chen, Ping, 2008. “Three Dimensions of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Looking for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Conference Proceedings, New York, Nov. 14, 2008, organized by EPS (Economist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and IRE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or Rethinking the Economy), Published in Clemency, France.
- Chen, Ping, 2010.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London; Routledge.

Chen, Ping, 2009. "China Approach in a Changing World," Invited Keynote speech at 6°. FORUM DE ECONOMIA DA 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 Sao Paolo, Brazil, Sept. 22, 2009. In Bresser – Pereira, Luiz Carlos, ed. *Depois da Crise. A China no centro do mundo?* (*After the Crisis, China in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Rio de Janeiro; Editora FGV.

Fukuyama, Francis, 1993.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Fukuyama, Francis, 2011.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Farrar, New York.

Harris, Marvin, 2001.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Altamira Press.

Jacques, Martin,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Johnson, S., 2009. "The Quiet Coup." *Atlantic*. 303(4): 46 – 56.

Maddison, Angus, 2010.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Historical Statistic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Studies (2007). Morris, Ion,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 New York; Farrar.

Ramo, Joshua C.,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er, London.

Rodrik, Dani,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New York; Norton.

Stiglitz, Joseph E., 2004.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IPD*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Williamson, John,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Zakaria, Fareed, 2008. *The Post – American World*. Norton, New York; release 2.0 (2011).

The Nature of China Approach vs. the Choice of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Chen Ping

(New Centr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udan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Whether a China model exists or not, this debate touches another fundamental issue in economics, i. e.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of labor is a convergent or divergent process? Equilibrium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have completel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eting models in market economie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China approach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nglo-Saxon model or so-called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addition, we argue that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cannot imitate the existing market economy model; the role of government cannot be pre-determined by ideological beliefs; and China's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constraints demand a visionary government to reconstruct China's economy, so that China can lead the world out of this 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 China Approach; Washington Consensus; Equilibrium Economics;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isionary Government

(责任编辑: 郅继红)